

「我的心没有离开那些人们」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

汪静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围绕农民、农村斗争的主题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反映了在桑干河下游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里进行土地改革的故事。小说的写作开始于1946年11月，完成于1948年6月，几乎与当时的土改运动同一进程。其间没有时间的距离，以从容地沉淀、过滤所取得的生活印象；没有历史的间隔，以利于对运动、对事件进行更充分的分析、评价，所写是‘当时当事’。(赵园，《也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土地改革的题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史无前例，而要完整展现土改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主义图景，在当时无疑对创作者提出了近乎严苛的要求。但是，丁玲奇迹般地做到了。刨除她中途参加了两次土改，完成这部小说花费的时间其实不到一年。从影响来看，小说不仅在当时得到国内文坛与政界的肯定，而且赢得了国际声誉——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它不仅是丁玲创作生涯中的里程碑，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初的比较显著的一个胜利”。(冯雪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我们文学发展上的意义》)

那么，丁玲是怎样写出这部经典“史诗”的？

动机与契机

1936年初冬，丁玲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到达陕北。不同于以往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在陕北处处走动的都是农民，“一走出机关，不论你干什么，总要和农民打交道”。(丁玲，《谈自己的创作》)如果说早些时候的作品如《田家冲》《母亲》《水》等，对农民的认识停留于抽象和表面，那么陕北则是丁玲真正走进农民内心世界的开始。

1942年，丁玲先后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坚定了她的“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决心。她从《“三八”节有感》的批评中走出，写出了《田保霖》这样的工农兵文学。当然，丁玲自己并不认为那是一次成功的转型，她认为那是毛主席为她走工农兵道路开通的绿灯，但这份鼓励却在她内心生根发芽。往后，她继续写出了《冀方杂记》《民间艺人李卜》等代表“新写作作风”的作品，有意酝酿长篇小说练笔。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她曾多次提到毛主席的鼓励支撑着她克服困难：“我有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穿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了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重印前言》)

陕北的养分、创作方向的确定、领袖的鼓励，这些都潜移默化地融入丁玲接下来所要创作的鸿篇巨制中。但这一鸿篇，一开始并不是有关土地改革的故事。“在延安时，我有一个计划：想写一个长篇——写陕北的革命，陕北怎样红起来的。想写那些原很落后的农民，在革命发展中，怎样成为新的人。我跑到过去闹革命的地方……我就那样上下跑，大雪天相当冷，我还是跑到这，跑到那。我下去了很长时间，回来时只写了两章，写不下去了。”(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

也就是说，在拟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有过一次失败的尝试。正是那次失败，让她意识到自己与农民之间的距离，自己对农村了解还不够深：“我以为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热爱，只是为了找些材料，是不可能进行艺术创作的。”

1945年10月丁玲奉组织的安排前往东北解放区，但因战火阻隔，她被困在张家口。一方面她向往着新生活火热的斗争，另一方面过去陕北的老朋友们不断召唤着她。“我忽然生长了一种感情，我深深怀念起陕北的农民们来了，一个一个熟人涌上我的心头……好像他们都在埋怨我，同我说些什么，责备我不应该抛弃他们，我实在很难受，我才发现我这是这样的爱他们，同他们如此的难舍难离……他们命令我再回到他们那里去，写出他们来，最后我决定了，我要先完成这工作，写出他们来。”(丁玲：《一点经验》)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丁玲主动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先后在桑干河两岸的怀来、涿鹿两县农村工作，由此实现了重新回到农民中间去的愿望。而正是这一契机，促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诞生。

在农村“落户”

回到张家口，当组织问丁玲是否还要去东北时，她的回答是：“给我一张桌子吧，我需要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场人物众多，但他们并不仅仅生长于土改运动的土壤中，有很多人其实一早就存在于丁玲的脑海中。“他们是在我脑子里生了根的人，许许多多熟人，老远的，甚至我小时看见的一些张三李四都在他们身上复活了、集中了……许多人许多人要岔来，拥挤叠踞在我脑中，我要和他们商量，他们又要同我争吵，一会儿增加了我的联想，一会儿又减去许多事物，有时觉得太膨胀，有时又觉得太单薄。”(丁玲：《一点经验》)土改实践就像一个按钮，激活了原本储存在她脑海中的人事故事，也复活了原先要写陕北革命故事的计划。可见，作者的创作有赖于长期的积累，经验并不见得都能立竿见影地得到转化，但在某一时刻那些有心的感悟就能达到融会贯通的奇效。

“创作，根本的问题是要写出人来，要写行动里的人，要从很多行动里去塑造人物。”(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很早就有意识地去观察、体会和理解行动中的人，她笔下的知识分子女性莎菲女士就是自己再熟悉不过的人物，成就了文学史上经典的“这一个”。但是面对不熟悉、陌生的场域，面对当时农村中复杂的阶级斗争，丁玲是如何写活人物的？

“深入生活”是丁玲老生常谈的关键词，这既是她创作成功的奥秘，也是她寄语后人的箴言。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土改中的农民，丁玲在涿鹿温泉屯村参加了一个月的工作。她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群众，让自己成为他们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当中的一员，从精神上在农村“落户”。“深入了解”究竟要达到什么程度呢？丁玲认为，“要同那里的人把关系搞得像自己的亲人一样。不单是你对他好，要他对你也像亲人一样才行”。那是一个将心换心的过程，如果我们像对待母亲一样对待村里的老太婆，但她反过来并没有像对待闺女一样对待我们，那就不能算深入了解了。

以这样的标准去衡量“算入生活”，就必然能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丁玲的一生无疑是波折多难的，但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她常常感到人间温暖。最初的震撼是她到晋察冀乡下的时候，站在一家农民的房门口，被屋里陌生的老大娘欢迎道：你瞧什么？屋里有老虎呀？意思是说：你怎么还不进来呀，屋子里又没有老虎，会吃你吗？农民的表达是这般朴素，但正是这样毫不生分的话语，让丁玲感受到自己在人民当中是无间的。后来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更是经常和老乡们在一块儿，无论什么人什么事，她都能聊得开。在《回顾与期望》中，丁玲这样调侃道：“作家要有这种本领：见人会同人说话，见‘鬼’会同‘鬼’说话，要有接触各种各样人的本领。你同各种身份、各种性格的人谈话，他都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你，这种本领是长期磨练出来的，而一个搞创作的人应该有这种本领。”把自己交给人民，丁玲在桑干河畔与农民一道战斗，同命运共生死，由此才建立了较深的情谊。丁玲在北大荒落魄的日子里，也是人民群众给了她无限的温暖。她发自内心地喜欢这些人，牵挂这些人。这些可爱的农民既是作家创作的素材，更是丁玲创作的动力。“我的心没有离开那些人们”，这是丁玲放弃去东北过新生活的重要原因，也是丁玲回北京多年后尚不改“行”写其他题材的内在于原因。

围绕一个中心

作家牵挂的人物那么多，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从笔下蹦出来？从本质上说，这还涉及作家的思想认识，有思想的作品才有灵魂，有思想的作家才能把握时代脉搏。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丁玲就有一个先在的思想。当初打算写中国的变化、写陕北的革命，不幸这个计划流产了，但其实这个愿望并未从丁玲的潜意识中消失。等到离开延安，过去8年的农村生活如冷海水上一泛一般，回馈给作家丰富的养料，所以丁玲才决定重回农村去。“当时我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思想：如果很好地反映了农村的变化、农民的变化，那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有这样一个主观意图。当时如果没有这个主观意图，就下去生活，那是没有目的。有了这个思想我就下去了……虽然只十几天，但是比较深入地卷进了斗争里去了。当时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战争马上要来到这个地区，全国解放战争之火马上要燃烧起来的时候，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农民的变天思想。就是由这个思想，才决定了材料，决定了人物的。”(丁玲：《生活、思想与人物》)

历来研究者对“变天思想”讨论不一，笔者倾向于学者宋建元的观点之一，将“变天”理解为一种积极行动。(宋建元：《释“变天思想”——浅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主题》)因为“使农民站起来”的问题不是靠共产党单方面来解决，农民作为被改变命运的主体必须自己站起来去作斗争。几千年来，农民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天”即是宿命，“变天思想”深刻反映了农民渴望摆脱宿命，渴望翻身做主人的心情。选择这样的主题思想，既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同时也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纵观文学史上的农民形象，在鲁迅笔下的农民多数是消极愚昧的，三十年代在茅盾笔下那些稍有觉悟的农民由于时代的局限也不可能彻底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就是丁玲当年自己写农民斗争时也只有抽象的想象。但在四十年代的解放区，伴随新时代的到来和作家自身创作条件的成熟，写“农民的变天思想”变得恰逢其时。不仅千千万万的农民在变，整个中国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历史将迎来崭新的一页。因此，这样的主题思想不可谓不深刻。

确定了主题思想后，丁玲在“选人用人”上显得收放自如。小说以农民与地主钱文贵的矛盾为贯穿全书的主线，作者围绕这一主线安排了多种性质的矛盾冲突，在有限的篇幅内尽可能展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表现阶级斗争方面，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写出了同一阶级内存在的种种差异，不同阶级之间又表现为互相渗透，这既是“变”也是“辩”。暖水屯农民的变天何以困难，正是因为尚有钱文贵这样阴险的地主在暗中作对，他不动声色而顽固地阻碍着新中国的“变”，而农村干部中又有像张正典这样的败类被钱文贵收买利用。但农民的变天又何以可能，则在于农民队伍中还有像张裕民、章品这样的优秀干部，同时地主家中更有像黑妮这样心地纯洁的少女。这样既有正面交锋，又有暗中渗透，正是小说中的“辩”，完全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先在的思想并不是来自文件报告中的概念公式，相反，它来自生活本身，这也是丁玲一再强调的“创作要有雄厚的生活资本”。翻阅丁玲在1947年往来的书信及日记，可以看到小说原本可以提前一年完成。但是，丁玲在写作途中常常为感到苦恼，觉得材料掌握得还不够充分，感到政策与生活存在某种不吻合等等，因此她才搁笔两次下乡再实践。事实证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不是图解政策的现实。相反，它一方面反映了政策是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斗争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土改政策的局限性。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者看到了更本质的东西，使得小说最终表现的内容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一本书以外的故事

——纪念《八月的乡村》出版86周年

萧耘

引言

萧红在她的散文集《商市街》中有一个章节，开篇第一句：“来了一个稀奇的客人。”此人是谁？——傅天飞。他是好友“黑人”介绍来的。黑人是舒群写作时的“笔名”，傅天飞与他曾是当年共读商船学校的同窗，而今是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员，刚从山上下来……他把在义勇军游击队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地倒给了老同学……希望以他的笔为山上的弟兄们写点儿什么，听到激动处老同学一个劲儿地拍大腿，但也表示这么大的题材自己驾驭不了。

“我给你介绍个人吧，他准行！”
“谁？”
“三郎。”
“就是刚刚出版了《跋涉》的那个三郎？他住在什么地方？我要见到他……”

回溯到88年前的一个傍晚，正是该吃晚饭的时候，傅天飞叩响了商市街25号的大门。萧红一边煎着饼，一边跑到屋子里听两个男人说话以至忘了炉子上的饼，糊了半块……

萧红在文中这样写道：“他们的谈话没有谈完，于是餐具我也不能去洗，就是站在门边不动……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杂着笑声，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我只记住他很红的脸。”

《商市街》记述了“两萧”那一段艰难的苦日子。她给自己的爱人取了一个好记而且上口的名字——郎华。“郎华”一刻没在她的身边，她就寂寞，心里总是慌慌的……而自那天听完“山上”的情况后萧军变得沉默了，常常在屋子里或院子里走来走去不停地踱步，若有所思。总感觉有一种汹涌澎湃的东西在冲腾翻滚……

不知为什么，几天来家门口时时有鬼祟的陌生人的影子出现，在警局工作的朋友催促萧军赶紧躲一躲，似乎“黑名单”上已经有了他的名字！萧红肚子疼的老毛病又犯了，几天也下不了床……为了筹措准备“外逃”的一切，萧军把她安排到朋友在乡下的家中休养。她只见萧军跑进跑出，说不出怀着怎样的心情在等他回来。被病痛和焦虑煎熬着的萧红这样写道：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还不能从床上坐起来。到了第九天，郎华从外面举着鲜花回来，插在瓶子里，摆在桌上……”

愁云散去，她不知道就在这几天时间里萧军成竹在胸，一部气势恢弘、紧张惨烈的东北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的图画业已完成构思。

为了不起“狗”们的注意，萧军决定用“田军”署名，告慰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天空的淳朴农民，书名就定为《八月的乡村》。

傅天飞的形象必须有，干脆就叫他“小红脸儿”，还有陈恒司令、钱鹰队长、萧明、李三弟、李七嫂、唐老疙瘩、安娜、刘大个子……以至日本兵松原、地主王三东家的“原型”准确定位，人物形象要在具体的事件中展示出来。这是一支并不庞大的“人民革命军”，但举的是红旗，唱的是《国际歌》，要让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在每个细节中得以体现……

鲁迅先生看过之后称“这是一部很好的书”。“……鲜艳地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而且有所得的。”给予了充分肯定。还有专家将此书褒扬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文学上的一面旗帜。”

捕客生涯

萧军逃离险象环生的哈尔滨，从大连乘船去青岛。这是一艘名为“大连丸”的日本邮船。此时的萧军已化名“刘毓竹”，自称到青岛投亲靠友。

就在即将登船时，出现了一伙凶神恶煞般的特务和日本水上缉查队的人，把他们拦了下来：“姓什么？叫什么？什么职业？和这女人什么关系？……”一个歪戴着帽子的家伙一口气不停地查问。萧军对答如流，面不改色。特务也斜了一眼身体孱弱的萧红，朝船的方向努努嘴，示意她可以走了……

接着又是一通不喘气的追问：“到青岛去干什么？投奔谁？做什么营生的？住哪条街？门牌多少？”按事先准备的说辞，萧军不慌不忙一一作答。他把提箱放在地上，摸出那没有任何破绽的“刘毓竹”的证件递了过去。

“看你的这双眼睛，怎么也不像个良民！”特务们实在不甘心，有几个已经在提箱中乱翻起来……萧军怒了，把原本搭在臂弯里的风衣狠狠摔在了地上！又索性从兜里掏出个苹果，气不打一处来地啃了一口……

“呜——呜——”开车的汽笛声响彻了码头。特务们一无所获，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并不高威猛的男子，捡起地上的风衣，掸掸浮土，提着鞋子朝船舱走去。神情气爽，大步流星……

“大连丸”开始启动了。“拿点儿茶咱们喝吧，口有点儿渴。”看着脸色煞白惊魂未定的萧红，萧军提出了这请求。

“茶？什么茶……我早把它带筒都一齐丢了！”萧红望着右手边的船舱，她说，记得临行的晚上，萧军是把那《八月的乡村》的草稿塞在了那个茶叶筒里的！

“唉，可惜了我的一筒好茶……”萧军拍拍衣服口袋，“在这儿哪！”他狡黠地笑着说。其实就在特务们翻脸的提箱的“夹层”，也还藏着他所搜集到的不少日寇罪行的图片。

在青岛，他们很快地安定下来。白天萧军去《晨报》编辑稿件；晚上“青灯对影”各写各的——萧红夜以继日，一心一意把那篇《王阿嫂的死》延续成《生死场》。萧军完成《八月的乡村》，“她以一笔写丹心”。萧军的写作“卡壳”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置那淳朴、善良、情窦初开却又敢蔑视了部队纪律的青年农民唐老疙瘩，他犯了难……

萧军不滿意自己，以至于想把写成的部分烧掉——“别，别！我替你抄出来。”每当这时候，已经完成了《生死场》创作的萧红一定支持他，陪伴他到海边走一走，吹吹渤海的风……而后来请鲁迅先生批评的用“美浓纸”抄录的《八月的乡村》的手稿，正是萧红的“劳动”。

萧军不知道自己所写的这样的题材，能不能对社会有推动作用，他陷入迷茫中——这可是国民政府所谓“言抗日者杀无赦”的时候！

青岛“荒岛书店”是萧军经常光顾的地方，中共地下党员孙乐文伪装这里的“老板”。偶然一次为解写作题材的苦闷，老孙支了一个“招儿”——找鲁迅。他是中国文坛的主将！

萧军鼓起勇气，寄出了一封向鲁迅先生“提问”的信——连同他和萧红离开哈尔滨时的“双人照”、一本《跋涉》和萧红誊写清楚的《生死场》手稿。

焦急的等待之后，收到的是先生“即复”的手札！这信竟使萧军和朋友们几次是“噙着眼泪”在读。先生答应他们的稿子“可以看一看”，并明确指出——“不必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绝不会一样。”

一个深秋的夜晚，海浪拍打着礁石溅起了高高的浪花，海风飒飒地狂啸……孙乐文把萧军约到了栈桥东头一个昏暗的角落，掏出了40元钱，对萧军叮嘱着：“党内出了叛徒！青岛市委委了，很多同志被抓。这钱你收着，我也得立即转移了，书店千万别再去。赶快撤……”萧军意识到情势的紧迫，他当下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给鲁迅先生写信别再寄信到青岛来。

往哪儿去？满洲是回不去了，青岛又出了这样的突发状况——只有先去上海，哪怕只见鲁迅先生一面，此生无憾！

在上海的日子

租下一个亭子间，买个小泥炉，再有米面油盐炊具之类以后，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人地两生，才有见到鲁迅先生向老人家求援。

细心的鲁迅事先已经派青年作家叶紫对这两个初闯上海滩的年轻人做了一番了解，知道这两人没有任何背景或党派勾连以后约见了他们。

从内山书店出来，疾步去了一个俄国人开的咖啡馆，刚刚坐实，满口啾哩哇啦的小海婴牵着妈妈的手也跑来了——这是一个纯家庭式的会见。鲁迅先生首先推过来一个信封，指指说：“这是你们的需要……”萧军知道那正是他给先生写信问他“暂借”的20元钱。鼻子酸了一下，一股暖流涌了上来……临出门鲁迅先生又掏出一把零钱，说是给回去坐车用的。萧军把萧红替他用“美浓纸”抄好的《八月的乡村》的稿子交到许广平先生手里，说请鲁迅先生批评。

“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早在给萧军的第一封信中鲁迅先生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了，转过年来春天，为萧军作《八月的乡村》的“序言”出现在鲁迅的案上，墨香犹在。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鲁迅先生竟给这两个年轻人写了50多封信，随时指导和告诫：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和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得好。”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躲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

鲁迅先生借住在“梁园豫菜馆”宴请只是为让这一对年轻人结识些“可以随时读得来”的文友。后来，他们搬到离鲁迅先生近些的地方可以随讨教，便也就成了“大陆新村九号”的常客，也常常吃在那里，萧红也不时地显露一下手艺。逐渐熟悉起来的小海婴视他们为最好的朋友，听到爸爸要给“两萧”写信了，他便一头钻进来还不住地喊着：“信笺我来选！要我……”所以现存的《鲁迅书信》手稿，属给萧军萧红的漂亮。

鲁迅先生去世后，在日本养病的萧红，心里很沉痛。她给萧军写信发来了“海外的悲悼”，她遗憾地表示她的哭声不能和大家的哭声混在一道……

萧军为鲁迅守灵三个日夜，扶柩入葬。在墓地他代表先生曾大力支持过的刊物做了慷慨的讲演。他说鲁迅是被敌人迫害死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就是敌人胜利了。“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插入我们的胸膛：我们要用自己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在场数以万计的民众齐声呼喊“复仇！”“前进！”声震九霄云天外。第二年的初春，萧红从日本返回，帮助萧军将《鲁迅先生纪念集》做最后的梳理完成。

谁在唱《奴隶之爱》

在《八月的乡村》有一个情节，是讲高丽姑娘安娜爱上了萧明这个有点文质彬彬的中国小伙。两个人形影不离的行为，引得队员们有意见，也影响到整个部队的情绪，大家议论纷纷……陈恒司令员分别做两个年轻人的思想工作。萧明是分队长，他明白“暂时分开”的含义，这就是命令。安娜不干，作为高丽部队高级将领女儿的她，怎么也不想明白我们怎么都是“饥寒交迫的奴隶”，难道奴隶就不能有爱？可是司令员的话也句句在理啊！她流着眼泪“枪毙”了自己的爱情，她在自己的小屋内如泣如诉地唱道：

“我要恋爱，我也要有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

1938年初，萧军从山西只身过黄河到延安逗留数日。毛主席听说就抽工友亲自去探望这位“鲁迅的大弟子”，真的是“礼贤下士”，二人交谈甚欢。萧军很感动，毛主席也很喜欢这个极坦白豪爽的人。

返回西安后，在一个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大会上，一位年轻的歌者的高亢、飘逸的歌喉，演唱着一首动情的歌：“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毁灭了吧，还是起来；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

萧军走上前，与这位年轻的歌者交流起来：“您这歌儿是从哪儿来的？谁教您的？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告诉萧军他叫王洛宾，是“西战团”成员，这首歌是他大学毕业后的处女作。

“歌词是哪儿来的？”
“好像是一本书里的……”
“什么书？”

“哎哟，一时还真给忘了……对，记起来了——《八月的乡村》，没错儿！”

“这《八月的乡村》作者是谁呀？”
“哎哟，这您可真为我喽！听说叫什么军。”

“田军。田军就是萧军，我叫萧军。你这歌儿写得有特色，我很喜欢。”
“哎哟喂！”王洛宾惊喜地把萧军拥在怀中。

原来从师范学院毕业后王洛宾被分配在北平的一所中学做音乐教师。每逢暑期学生放假了他就一个人到距离学校不远的西直门外高粱河游泳……大约是“七七事变”前后，有大批的东北流亡学生拥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不绝于耳，他们也常到高粱河游“野泳”，发泄胸中的愤懑。

王洛宾总见他们在读一本叫《八月的乡村》的书，读到动情处竟能抱头痛哭，泪流不止。

当这些同学知道了这独往独来的北平人竟是“学音乐的”，便邀请他把那一段“奴隶之爱”给谱个曲，并教会他们演唱。一来二去，每逢“游泳的时候就一齐唱起来，几乎成了这‘野泳队’的队歌……”

从这“奴隶之爱”起，萧军与王洛宾的友谊延续不断。不管谁处在什么坎坷的境况，彼此的心中都装着对方。1947年重版《八月的乡村》时，萧军将“奴隶之爱”的词曲附于书后，为保护曲作者不受反动派的迫害，他以“L-P”这两个英文字母，做了“骆宾”的缩写化名。

有些事说来蹊跷——董必武亲口告诉萧军：《八月的乡村》是他们在长征路上拆开了页，分着读完了的，是谁把这国民党反动派“严禁”的书刊带给红军的？众说纷纭，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谜只有请学者去解释了。

